

台灣結、中國結與台灣心、中國情： 台灣選舉中的符號政治*

徐火炎**

《 本文摘要 》

本文將集體層次上「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文化叢結概念，落實在個體層次的「中國情與台灣心」價值信念上分析，並與其他相關的政治心理變項，來說明台灣選舉中的所謂「符號政治」。以1998年與2001年兩次立委選舉的調查資料為基礎，分析結果發現：選民的「台灣心—中國情」之價值信念，可以有效地在經驗上掌握到「台灣結」與「中國結」集體潛意識的政治心理特徵；此外，選民的「中國情」與「台灣心」的心理，不僅是直接與間接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也是各種可視為構成「中國結」與「台灣結」組成因素的主軸。本文分析指出，台灣選舉的符號政治，主要是表現在「中國結」與「台灣結」衍生的對立性政治情感上；這兩種「原鄉」集體潛意識的文化叢結，在選舉競爭過程中，被轉化與極化成為對立的政治情緒。分析結果也發現，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如省籍、族群認同、政黨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等，都輻輳交疊在「中國情與台灣心」為主軸的價值信念上。本文以因素分析來呈現這些變項的交集點，並從它們的共同因素基礎上，賦予政治上所謂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經驗內涵。

關鍵詞：政治心情、政治情緒、政治情感、符號政治、台灣心與中國情、台灣結與中國結

* 本文曾發表於「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主辦之「2002年選舉與民主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2002年11月19-20日）。作者特別要感謝當時評論人何思因教授及後來三位匿名的論文審查人，謝謝他們提供許多寶貴的參考與修改意見。此外，作者也要感謝中研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侯佩君小姐，謝謝他在百忙當中抽空特別為本文初稿繪圖製表及文字上的校對與除錯。當然，文中疏漏之處在所難免，皆應責成作者本人。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長久來，台灣的選舉充滿著政治情緒的激昂與政治情感的訴求，政黨及候選人提出的政策良窳，反而不是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符號政治所指的，就是選民以政治情感因素作為考慮黨派投票抉擇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台灣社會中，政治情感因素在個體層次上，可以台灣心與中國情兩種對立的政治心理來貫穿，而背後所隱含的則是集體層次上所謂的台灣結與中國結的集體潛意識。

一、政治情感與符號政治

對個人而言，心情是一種心理狀態、沒有特定心理對象的情感表達方式。同樣地，政治心情（political mood）也是不針對特定政治上的人事物的感受與情感表達，但不同的是，「政治心情」的概念所指涉的是一群人所共通的感情狀態。例如，James A. Stimson（1991：17-18）就認為，「心情」一詞在其他的生活面的用語中，早已是普遍耳熟能詳的字眼，卻是透過政治評論者的口中，才逐漸被引進到政治生活的領域；然而，在一般的民意研究上，對具有政治影響後果的心情之概念，並沒有被妥善地加以界定。因此，Stimson 在使用「政策心情」（policy mood）的概念時，才從一種「時代精神」（spirit of the age）的意涵中（註一），將心情指涉為「橫跨時間與環境的一種共通心理上之感受」，所以，他將「政策心情」視為是：民衆在看待公共政策與議題時，所共通抱持的一種心理預存傾向。在這層理解下，政治心情的意義就可看成是：民衆對於政治上人、事、物所抱持的一種共通且持續的心理上感受。

心情的好壞對個人來說，如上所指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這種心情好壞的狀態在有特定對象宣洩出來時，則便成為所謂的「情緒」。政治情緒（political emotion）所指的意義也是相同的情況，但有別於個人情緒的是，政治現象的理解比較恰當的方式，要從個人層面延伸到集體層面來加以觀察；因此，政治情緒也指向於民衆共通的心理預存傾向，針對政治上人、事、物特定對象所表達的心理感受。在 George E. Marcus 等人（2000：39-41）的研究中，他們就認為情緒是有意識範疇的一種情感反應（affective reactions）；換句話說，情緒被看成為是有對象情況下的一種心情表達或宣洩，它是在「刺激—反應」的機制下產生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情緒所牽動的「狂熱度」（level of enthusiasm）與「焦慮度」（level of anxiety），都比一般之情感、心情等心理特徵所帶來的為高。此外，他們也同意 Norbert Schwarz and Gerald L. Clore（1996）的說法，認為情緒既然是以清楚的特定對象才產生的一種情感反應，所以，情緒所涉及的認知成份（cognitive component）也較多，比較可以清楚地歸因到特定對象的刺激原（target stimulus）（註二）。

無論是心情的心理狀態還是有特定對象而來的情緒，一般來說都由個人心理主觀上的評價（evaluation）而來，而且，具有政治上意涵的心情、情緒與評價等，在以往政治行為的研究上，都被泛稱為「政治情感」，以有別於基於理性計算的其它政治影響因素。在 David O. Sears and Carolyn L. Funk（1991）的研究中，就把基於理性計算來解釋政治行為的有關理論，稱之為「自利理論」（self-interest theory），以凸顯他們所強調以「政治情感」要素來理解政治態度或行為的所謂「符號政治理論」（symbolic politics theory）。Sears（2001：14）甚至進一步指出：「政治符號（political symbols）經常喚起或動員人類的情緒。」他認為符號政治理論的特色，在於強調有關政治訊息的處理模式（mod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乃是一種以政治情感為核心的所謂「符號處理過程」（symbolic processing）；在這種訊息處理過程中，無論是訊息的接收、儲藏或喚起，以應用在政治行為的表現上，都具有直接的影響力。Sears（2001：23-24）也同時指出，在影響一般的政治行為上，政治情感因素的作用經常壓倒認知因素的效果，而讓理性自利的考慮變為次要或微不足道。Sears 甚至指出，在投票行為研究上所發現的，那些較早決定與介入政治較深的「理性選民」，不外就是一群擅長以理性考慮的理由，來合理化他們基於政治情感而投票的選民；實際上，他們是運用理性考慮來包裝情感因素對投票抉擇的取捨。

二、台灣社會的政治情感

二十世紀末走進電子數位化傳媒的時代以來，大眾社會的庶民一方面不易抗拒傳媒發達所帶來訊息迅速傳遞之感染效果（contagion effect），另一方面也很難避免政治菁英透過傳媒與民意調查工具以挑起、形塑甚至操弄政治情感為目的之種種刺激。因此，上述關於心情、情緒與評價等「政治情感」概念所涵蓋的政治心理特徵，就成為理解大眾政治不可或缺的解釋因素，同時並逐漸受到政治行為學者的重視（註三）。這只是從宏觀的政治行為研究之趨勢，來看政治情感因素受到重視的情形；此外，研究政治情感的顯著性，仍然需要扣緊在時空與對象的條件—是否有助於我們了解研究的現象本身，來加以認定。以下，就讓我們稍微掃描一下台灣社會受到政治情感因素牽動的情形。

毫無疑問地，對觀察台灣現實政治動態的人而言，稍加注意即可輕易地發現：無論是地方或中央級議會的問政上，還是選舉舞台的選票競爭中，都充斥著對立性政治情緒宣洩的語言與動作；同時，政治情感的暗示也成為牽動政治菁英合縱連橫、以及影響選民大眾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台灣這種普遍以政治情感為訴求目標的政治過程，雖然不利推動以理性為內涵的民主政治品質，但卻與政治民主之本質無關，反而是解除戒嚴以

後政治民主化的發展結果。解嚴與民主化以後，一方面政治菁英可以公開地透過挑動民衆政治情感來競逐權力，另一方面民衆可以無懼地將心情與情緒在政治評價上表露出來，或投射在選擇政治代言人身上。同樣是襯托出心情與情緒的一般情感，在概念上雖然與政治情感具有不同的內涵，但在民衆的心理上，它們只是一線之隔而已。政治生活只是人類生活的一面，因此，民衆的一般情感在跨入政治行為的範疇時，才轉化爲可觀察到的政治情感。所以，政治情感的凸顯性，追根究底則是與文化傳統或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情感發生的情境等，具有較密切的淵源。

從政治情感表達的角度加以觀察，我們就比較可以理解所謂政治文化整體表現在政治過程中的「政治風格」(political style) 概念(註四)。在 Sidney Verba (1965) 討論比較政治文化時，認爲政治風格是指涉兩種政治信念系統所構築的政治文化表徵：一種是屬於純粹文化性質的特性，指涉到政治信念系統的結構上與形式上的特質——這並非指信念的內涵本身，而是指抱持或表現信念的方式而言；另一種則是指現象發生範疇的特性，指向於政治文化系統與政治互動系統兩者之間的交界——這也就是說，政治風格也指涉到基本政治信念表現在政治互動上的非正式規範。無論就抱持或表現基本政治信念的方式，或規範政治互動過程的不成文規則而言，都是建立在評價的、政治情感的發生作用之基礎上。一般熟知的台灣政治人物在「問政上的政治風格」(即問政風格)，無論在地方或中央級政壇上，都可以輕易發現政治情感所帶動出來的政治行為模式，例如：拉扯麥克風、打架、攻擊謾罵等不一而足。在選舉政治過程的舞台上，政治風格的表現亦常常透過政治情感的觸媒來發揮，例如：抬棺、斬雞頭、詛咒發重誓等種種戲碼上演。假定根據 Sears (1991) 的說法，政治情感可視爲是任何透過政治符號而激起的預存心理傾向，那麼在歐美民主國家的選舉競爭過程中，以政治情感爲訴求的情形也極爲普遍，只是政治情感所指涉的內涵，具有不同的特性而已。換句話說，政治情感的宣洩表現在歐美的政治過程中，政治風格的呈現主要以隱性且含蓄的方式、埋藏在理性的名目下進行；然而，在台灣的政治過程中，政治情感的表達則顯性且誇大地、以理性計算的政治目的透過感性的方式來呈現。

沒有熱誠的政治是沒有活力的政治，而過度狂熱的政治則是具有危險性的政治。這是引申自 Bernard R. Berelson (1952) 關於經驗民主理論的研究——肯定冷漠選民 (apathetic voter)，尤其是美國社會不關心政治的選民，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正面作用。政治情感的訴求可以帶動政治的熱誠度，讓選民大眾更關懷、積極參與政治；這樣的發展結果或許會像 Berelson 所擔心的，最後會導致了民主政治運作上的困難；但另種後果就是，煽情的政治動員，往往激起政治情緒的對立與心理的焦慮感，而其最後所導致的倦怠感效果 (fatigue effect) 則是大衆對政治的冷漠與疏離。台灣的政治發展史正

好佐證了這兩種過程：首先，一方面，戒嚴時期的選舉乃是民衆直接參與政治最重要的管道，而選舉的「政治假期」也讓民衆可以定期地宣洩政治的情感；另一方面，反國民黨之「黨外」參選人，也充分地運用選舉來動員選民大眾的政治情感，結果帶動了選民高度的選舉參與率；因此，可說是關心政治與具有政治熱誠的選民大眾，催生了挑戰威權體制的在野政黨，進而推動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其次，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讓民衆的政治情感，不限於選舉的政治假期而隨時都可以被政黨與政治人物加以利用；結果，頻繁的政治情感動員，不僅極化了社會中不同文化與認同的對立性，同時也拉高了民衆在政治心理上的焦慮感，最後衍生出政治的冷漠與疏離，進而顯現在近年來逐漸下降的投票參與率之上。

三、台灣選民政治情感的主要焦點與本質

上述中，無論在政治菁英的問政風格上，還是表現在大眾政治的行為上，都可以觀察到政治情感的影響作用頗具普遍性；同時，政治情感的作用在台灣所以比歐美社會更具凸顯性，固然一方面可能是傳統政治文化傾向於以感性包裹或夾帶理性目的方式所使然；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帶動台灣政治情感的環境因素，以及政治感情所指涉的文化內涵等，具有必然的特殊性。就歐美社會而言，除了因政治上左右意識型態差異，而衍生為對政黨、政治人物及政策相關的偏好情感外，政治感情指涉的主要文化內涵，就是圍繞著種族所衍生問題而來的不同政治評價或偏見。然而，對台灣社會來說，民衆對政黨、政治人物與政策相關的政治情感，雖然不是建立在左右分歧的基點上，但由於近年來政黨競爭的過程，卻把民衆對政治感情的焦點推到「中國大陸—台灣」的統獨問題上；此外，由於對「中國大陸—台灣」的政治分歧，又涉及到更深層的「國家認同」的基本問題。因此，國家認同與統獨的議題，就如同歐美的「左右」意識形態的分歧與種族歧視一樣，構成為區辨一般民衆不同政治情感與情緒的刺激原。

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成為民衆政治情感的焦點，又具有怎樣的特殊性？這個問題不僅牽涉到歷史上淵源的因素，也糾葛在當前交錯且不確定的環境影響下。首先，以歷史淵源的角度來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是炎黃子孫的、儒家文化的、漢人為主體的社會；無論就血緣還是文化的承傳上，都具有無法割斷的歷史關係。其次，以糾葛的環境影響來看，毫無疑問地，台灣解嚴後的政治民主化推行與台海兩岸關係的解凍，可說是並進的過程。政治民主化與兩岸關係解凍，可說只是順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與後冷戰來臨的必然發展趨勢，但就台灣社會而言，卻帶來互相矛盾的發展結果。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後的開放社會，帶來的是台灣人民擁有更大的言論自由權，甚至可以透過選票來取

捨國家的政治前途；因此，主張（無論何種形式的）中國統一與倡導台灣獨立的言行，只要還在「中華民國」的框架內進行，都是人民享有的自由權而不構成所謂「叛亂」的言行。另一方面，在兩岸關係的解凍與民間社會的互動之後，讓愈來愈多的台灣人民親身體驗到大陸與台灣社會的歧異性，加上中共向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指稱「中國」，以及一再宣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等，結果不僅逐漸造成人民對「中國」認知的分歧，同時也更疏離台灣本土對中國大陸的歷史情感。在以往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戒嚴時代，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就是追求「中國統一」，而倡導「台灣獨立」只是少數反國民黨獨裁政客私下的政治意願；同時，在台海兩岸敵對隔離的情況下，國民黨政權倡導以三民主義「反攻大陸」，似乎才是「中國統一」的唯一正解。然而，民主化與兩岸關係解凍的並行關係，演變至二十一世紀的開始，則是以台灣本土為訴求的民進黨取代背負統一使命的國民黨，而成爲主導台灣政局的舵手；因此，全民公投式的台灣獨立言行，反而成爲官方不諱言的主流想法，甚至可說，在無法獲得中共「放棄以武力解決」的情況下，以公民公投的方式追求台灣獨立，才是民進黨主政下解決國家前途的正途。

政治民主化與兩岸關係解凍的社會互動，所涉及的另一個極令人注目的議題則是，關係著台灣社會命脈的經濟發展問題。在後冷戰的時代中，中國大陸可說是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互動，尤其是經濟力量的牽引過程中，無論倡導台灣獨立或主張中國統一論的台灣人民，都無法否認台灣在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性。在務實的經濟活動面而言，無論統派或獨派，都不會排除與中國大陸建立更進一步的經濟合作關係，而積極準備或加速「三通」的實踐。這是一種矛盾的關係：一方面，中共認爲只有在揚棄台灣獨立而接受「一中」（無論是各自表述，還是以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詮釋）的條件下，經濟的進一步合作關係才成爲可能；另一方面，台灣無論在國民黨李登輝總統主政的時期，或在民進黨陳水扁總統掌權的階段，居於主導政策地位的官方政治思維則是採取「政治與經濟的分離」：經濟上希望攜手合作，政治上實際分道揚鑠。這也是台灣人民在政治感情與思維上，充滿矛盾、對立與糾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四、台灣結、中國結與台灣心、中國情：集體層次的概念與 個體層次的測量

基本上，無論是「情結」（complex）還是「意識」（consciousness），這些辭彙所指稱的意義，不外乎是嘗試說明一群人生活在一起、享有共通的文化、語言與歷史經驗而形成的文化叢結。這種跨越時間與個人經驗的文化叢結，本質上可說是一種集體潛

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的心理現象；以 Carl G. Jung (1960, 1969) 的觀點而言，這也就是指一種經歷共通創傷經驗而形成情感、記憶與印象所交織的，而且也是超越個人而集體存在的潛意識心理。Jung (1969) 認為以經歷共同生活演進歷史的一個群體而言，在情感內涵上都共通具有一組相互關聯的想法與記憶之形式，而稱之為「原型」(archetype) (註五)。

就文化叢結的角度而言，無論是「中國結」與「台灣結」、還是「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註六)，這概念的內涵就指向於兩種烙印在個人內心深處的集體潛意識，而分別強調「台灣」與「中國」為共同生活演化經驗的「原型」。Jung (1971) 同時也指出無論是集體或個人層次的「情結」心理現象之產生，都與「劣勢」(inferiority) 有關。就個人層次而言，劣勢的情境會導致個人潛意識的心理創傷，而集體層次感受到的劣勢情境，則會導致群體共識的潛在危機意識或憂患意識。

Jung 關於「情結」與「集體潛意識」所以產生的說法，正可以印證中國結與台灣結、或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所以在台灣社會的出現。一方面，中國結與中國意識可看成是，由於近百年來「中華民族」遭逢日本與西方強權的侵略瓜分，而在劣勢處境與憂患意識中逐漸根植於一般華人身上；另一方面，台灣結與台灣意識則可說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後，「本省籍族群」為掙脫威權統治下的政治劣勢而出現的。的確，長久以來在國民黨統治的戒嚴體制下，外省籍與本省籍族群的政治權力，都呈現不均衡分布的緊張關係；同時，在長期「推行國語」與代表「中國正統」的政治格局中，曾受到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與受到二二八事件創傷的本省籍，在政治上可說是居於劣勢地位；也因如此，在1980年代以來流行的「台灣結」與「台灣意識」辭彙，才被建構來指稱以「台灣」為共同生活演化經驗的「原型」，而它所強調的劣勢處境之悲情內涵，也廣泛引起本省籍族群的共鳴。從社會互動的後設角度來看，「中國結」與「中國意識」的概念也相對因應而生，來泛指「中國」為共同生活演化經驗的一種「原型」。

然而，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這兩大族群的政治權力不均衡關係，卻形成一種地位對調的大逆轉；以往居優勢政治地位的外省族群，自解嚴後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以來，似乎在一夕之間成為政治上的弱勢族群；相反的，本省籍族群則在選舉政治中，出頭天而成為主導政局的發言人。在這種前後倒轉權力不均衡關係的發展過程中，外省籍族群不僅在政治上處於少數族群的劣勢地位，而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對立下，無形中也背負著可能被指控「不(愛)認同台灣、身在台灣心在大陸」的政治原罪；因此，對外省籍族群而言，指涉中國大陸為情感內涵所共通具有之想法與記憶的「中國結」與「中國意識」，也相對凸顯出來。如上述，隨著政治的民主化進程，以及兩岸關係的解凍與互動，伴隨的就是所謂「中國結」與「台灣結」或「台灣意識」

與「中國意識」對立的升高；同時，在政黨競爭與選舉動員的推波助瀾下，也逐漸賦予它們在統獨政治立場上的明示與暗示的雙重意義（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進而凸顯出它們作為選民政治情感的依據，或成為政治人物激發選民政治情緒的訴求焦點。

對於這種衍生自文化叢結的集體潛意識，無論是中國結與台灣結、還是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在個別的學術傳統中，自有不同的研究切入點來論述與理解；換句話說，中國結與台灣結（或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內涵，並不止於（或限定於）政治意義上的範疇；然而，就政治行為學者所關心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要強調的是這種文化叢結具體化表現在政治上的評價信念、以及所衍生出的情感等政治心理特徵。因此，在觀察與分析個體層次的資料上，我們以「中國情」與「台灣心」等「情結」的概念，來分別指涉具有集體潛意識特性的「中國結（意識）」與「台灣結（意識）」的概念，以區分兩類概念指涉個體與集體分析層次的有別。

就個體層次的分析來說，上述這種衍生自文化叢結的集體潛意識心理，具體表現在行為者身上時，可說相當於 Milton Rokeach（1968）指出的「原始信念」（primitive belief），亦即：一組被持有者視為理所當然而具有公理性質的（axiomatic）核心信念；他同時指出，當一個人的原始信念被質疑時，信念持有者除了會否定或逃避質疑之外，同時也會產生強烈的情緒（震驚、生氣、憤怒、高度不安等）反應。在這層理解上，我們可藉著以「中國」與「台灣」為對象的評價性信念，來具體地觀察中國結與台灣結等集體潛意識投射在行為者身上的心理特徵。當然，對於性質上屬於建構概念的測量，無所謂對或錯、而只有是否適當或有效的問題，而且經驗研究本身自有它的侷限性；因此，本文以下所指中國結與台灣結，主要是指測量觀察到所謂「中國情」與「台灣心」等評價性信念所構成的心理特徵。

在政治經驗研究上，胡佛可說是最早發展量表來觀察民衆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心理的第一人。他所領導的「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小組（註七），在1996年的總統大選研究中，首先發展建構出一套測量選民「中國情結」的量表，來觀察投射在一般民衆的中國結心理；而後來在該研究小組主持研究的1998年第四屆立委選舉與二屆台北市長選舉調查中，則進一步增訂施測「台灣結」的量表。這完整的一組「中國結—台灣結」之量表（見下面資料分析表所列題目），後來分別應用在東吳大學政治系黃秀端主持的「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以及中正大學政治系黃紀主持的「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本文即根據胡佛所發展的量表與上述選舉調查研究的資料為根據，來探討選民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心理，並進一步分析這種「中國情」與「台灣心」等政治心理與投票行為的關係。此外，本文利用1998年四屆立委與2001年五屆立委選舉等兩次的選後調查資料，從跨時間比較的視野來進行分析。這兩筆資料皆

以台灣地區選民為母體，依分層比例抽樣的面訪資料。

如上所指出的，本文以「中國情」與「台灣心」分別指：衍生自文化叢結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等集體潛意識投射在行為者身上，而在個體層次上加以觀察與測量得到的評價信念；換句話說，本文以「中國情」與「台灣心」來指稱個體層次與經驗研究上的中國結與台灣結。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測量則根據胡佛領導的研究小組所發展出來的量表施測。首先，讓我們回顧應用中國情與台灣心的研究發現：在1996年的總統大選研究、1998年二屆台北市長選舉與2000年總統選舉的研究分析中，都發現：選民的中國情與台灣心，與省籍、「台灣人—中國人」的族群認同、台灣人驕傲感、中國人驕傲感、李登輝情結、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等變項都具有顯著的相關關係（徐火炎，1999，2001，2002）。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這些被認為對投票抉擇具有決定作用之省籍及政治心理因素等變項，與中國情與台灣心之間的關係，可以表列示意如下：

表1 中國情、台灣心與省籍及其他政治心理因素間的關係

	中國情	台灣心
省籍	外省籍	本省籍
族群認同	中國人	台灣人
台灣人驕傲感	負相關	正相關
中國人驕傲感	正相關	負相關
李登輝情結	負相關	正相關
國家認同	中國	台灣
統獨議題立場	中國統一	台灣獨立

從表1中，可以看出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測量，的確掌握到「中國結」與「台灣結」之集體潛意識表現在個體層次上的心理特質。進一步而言，上述中國情與台灣心所測量的評價信念，以及環繞這評價信念的種種相關因素等，都是一般指稱「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內涵。毫無疑問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具體表現在個體層次上的心理現象，尤其是指促發個人政治情感與情緒的主要根據，基本上可說都是上述構成中國情與台灣心的這種評價信念所主導的。當然，上列各種與中國情、台灣心等價值信念具有密切相關的因素，假定以因果關係的分析架構來加以觀察，有些可說是中國情與台灣心等政治心理的另一種內涵（例如，中國人或台灣人的驕傲感），有些則可能是決定中國情與台灣心的因素（例如，省籍背景與族群認同等），有些則更可看成是中國情與台灣心等變項所影響的結果（例如，李登輝情結、分歧中的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態度等）。上述引

文中，對於分析所涉及變項間的可能因果關係，雖然在不同的研究目的與主旨下進行，皆有一致共通的看法；因此，本文不擬在此重述，以下的分析架構僅限於本文所探討變項間關係的進一步說明。

五、分析架構與研究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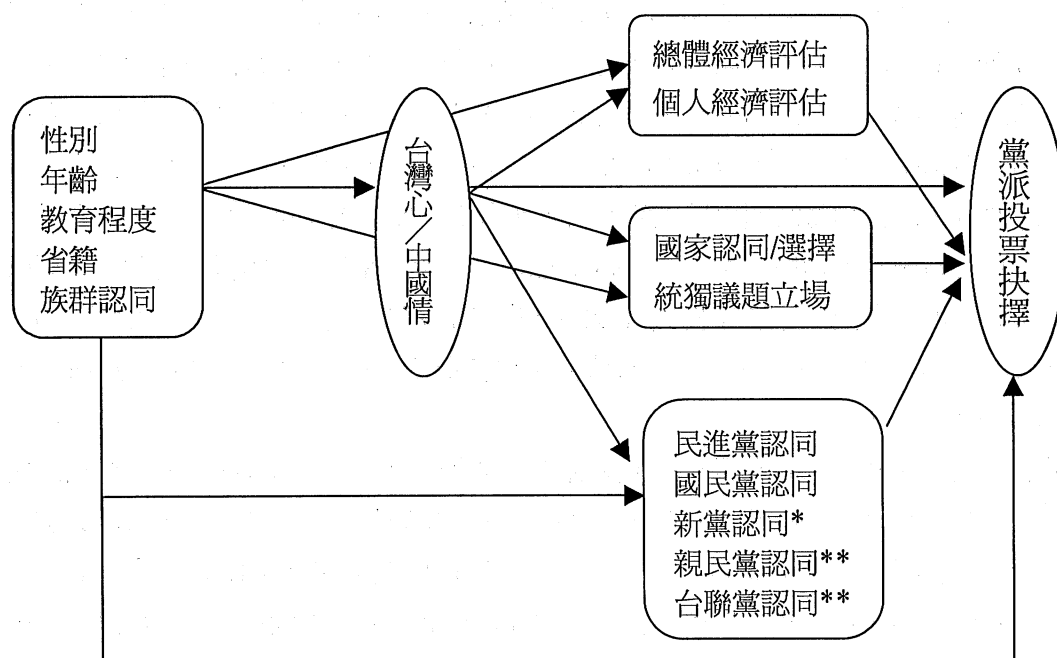
上述 Sears 與 Funk (1991) 對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中，將選民以政治情感因素為投票抉擇考慮的現象稱之為「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他們的研究發現也說明在決定美國選民黨派投票抉擇之中，情感因素的影響遠大於理性的自利考慮；同時，我們上述中也指出，在民主化轉型過程與兩岸關係解凍的糾纏情境下，台灣的選舉可說是一種典型的符號政治。以 Richard Rose and Ian McAllister (1992) 的看法來說，以政治情感為投票考慮的情形稱之為「表意性投票」(expressive voting)，而以理性自利出發來取捨那個政黨主政才可極大化他們利益的投票，則為「工具性投票」(instrumental voting)。他們分別從總體與個體的資料基礎上，分析英國歷次國會大選的研究發現指出：「選民的工具性投票乃是例外而非常態」(Rose and McAllister, 1992: 121)。既然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的選民，都以表意性投票為大宗，由此看來，台灣的選舉政治是一種屬於「表意性投票」為主的符號政治，就更不足為奇。話雖如此，但我們仍需經驗資料來說明，並進一步確認符號政治上或投票表意上的內涵。

從以上對概念的釐清與相關文獻的回顧，我們也進一步說明影響台灣選民表意性投票的主要因素，乃是中國結與台灣結而衍生的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政治心理。本文以下的分析即以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政治心理為核心，剖析它的前因與後果，並以此來說明台灣選舉的符號政治。根據這樣的研究企圖，本文的分析架構與分析變項之間的因果間關係，如圖1所示。我們所要驗證的假設即圖1中箭頭所表示的變項之間因果關係。根據圖1的分析架構，以最後的依變項逆向的次序來看，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假設乃是：在可能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諸因素之中，台灣心與中國情的政治心理，不但對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具有直接的影響，也是政黨認同、國家認同(選擇)、個人經濟與總體經濟評估、及統獨立場態度等、對黨派投票抉擇具有影響效果之變項的決定因素。透過此種關係的驗證，即在於說明台灣選舉政治乃是符號政治的屬性。

此外，關於個人特徵與社會人口學上的屬性等變項，對於中國情與台灣心、政黨認同、國家認同(選擇)、個人經濟與總體經濟評估、及統獨立場態度等變項的相對影響關係，也是本文分析的重點；同時，在個人特徵、社會人口學上的屬性與中國情、台灣心等變項比較，對其他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例如：政黨認同、國家認同(選

擇)、個人經濟與總體經濟評估、及統獨立場態度等,本研究的假設亦指出,中國情與台灣心的影響效果相對較為顯著。這種關係的驗證,同時也在於說明:中國結與台灣結等集體潛意識投射在個人而形成的中國情與台灣心之政治心理,才是選民政治情感因素的促發因素(priming factors)。最後,圖1所示的箭頭方向之變項間關係,基本上就是指涉一個因果關係的假設,為簡化起見,這些衍生的個別研究假設,則待以下資料分析的鋪陳與假設驗證時,再加以指陳說明。

圖1 分析架構與研究變項



* :新黨在2001年五屆立委選舉中,由於得票率極低(2.8%),只當選一位區域立委,因此,在2001的資料分析中,不列入分析;但在1998年四屆立委選舉時,新黨仍獲得7.06%的得票率與11席的立委席次,而居第三大黨。

** :在1998年的四屆立委選舉時,尚無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出現,因此,只在2001年第五屆立委選舉資料的分析中,才包括進來。

六、研究變項的測量與量化操作的說明

首先,就中國情與台灣心兩個變項的測量而言,如上所述,本文根據胡佛所設計的

量表來施測，測量題目如下表2中所列。我們所測量的「中國結」與「台灣結」這種文化叢結的集體潛意識心理，主要是從表現在個體層次上有意識心理的「原始信念」來加以觀察；換句話說，我們乃是以「中國情」與「台灣心」概念在個體面加以測量—從民衆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為對象中，觀察他們所抱持的一種自覺驕傲、認同、歸屬、自主與休戚與共等政治信念，來操作中國結與台灣結表現在個體層次上的「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概念。

根據1998年四屆立委與2001年五屆立委選舉等兩筆選後調查資料來看，如表2資料分析結果的所顯示，民衆這種分別以中國與台灣為評價對象的政治心理，在性質上是具有可區辨的、而且也自成叢結的兩個不同因素結構。這兩筆資料顯示出的相同因素結構，一方面除了可以說明：在測量的實質意義上，「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概念，確實可以掌握到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文化叢結集體潛意識、所投射到個體層次上的政治心理之外；另一方面也指出：在個體層次上所觀察到「中國情」與「台灣心」的價值信念，具有穩定的性質，不受測量時間與環境的不同，而有不一致結果；再方面也說明：在量化研究上，我們施測「中國情」與「台灣心」的量表題目，具有高度的再測信度。我們以下的分析，即根據表2因素分析的結果，以具有標準化性質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來建構「台灣心—中國情」的綜合量化指標（亦即台灣心的因素分數減去中國情的因素分數）。

雖然，以下我們將以「台灣心—中國情」的綜合指標、以連續性的程度來觀察民衆的中國情與台灣心之心理特性；但在進行分析之前，我們先從中國情與台灣心的實證資料基礎上，來說明具有「中國結」與「台灣結」等理想型的民衆，以「中國」與「台灣」為「原鄉」指涉對象時，究竟具有怎樣的評價信念。從表2的因素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中國情較濃厚而具「中國結」傾向的民衆，一方面會以做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也傾向於俾倪那些認為不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另一方面，比較同意以耐心來克服臺灣和大陸在生活上的差異，以完成國家的統一，也比較會接受台灣與中國大陸統合在一起才會有前途的觀點。

相對來說，台灣心價值信念強而具有「台灣結」傾向的民衆，一方面傾向於要割斷與中國的關係，來建立一個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以掌握台灣人自己的命運，也會認為台灣要追求自主獨立，中國無理由加以干涉；另一方面傾向於比較贊同「在台灣長大的外省人，如果不認同台灣，最好回大陸去」的主張，同時，也比較能夠贊同：中國的歷史是中國的，我們要創造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再方面也傾向於不同意「以耐心來克服臺灣和大陸在生活上的差異」的說法，心理上更不會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統合在一起才會有前途。

這樣的測量結果，不僅說明「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經驗量表題目，在施測上具有高度的內在效度；同時也顯示出，集體層次上文化叢結中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等集體潛意識，也能夠在個體層次上加以轉化成反射性的原始信念，作有效地觀察。當然，假定我們的分析與論述具有說服性的話，中國結與台灣結對台灣選民大眾的影響，則可以透過選民的中國情與台灣心之政治心理，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作用中，來理解台灣選舉中的符號政治。

表2 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測量與（轉軸後）因素分析結果

測 量 題 目	1998年四屆立委		2001年五屆立委	
	台灣心	中國情	台灣心	中國情
1.不管中國是怎樣的落後，做一個中國人是最值得驕傲的。	-0.1392	0.7257	-0.2161	0.6560
2.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看法是不可原諒的。	0.0311	0.7195	0.0364	0.7721
3.不管臺灣和大陸在生活上有多大的差異，我們都要有耐心的加以克服，完成國家的統一。	-0.4087	0.6635	-0.2560	0.6702
4.台灣與中國大陸合在一起才會有前途。	-0.4851	0.4424	-0.4415	0.5030
5.中國的歷史是中國的，我們要創造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	0.6171	-0.2307	0.7235	-0.2043
6.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外省人，如果還是不認同台灣，最好回大陸去。	0.6622	0.0477	0.7442	0.0049
7.要掌握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就是要割斷與中國的關係，建立一個兩千一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	0.7400	-0.1747	0.7584	-0.2031
8.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台灣要追求自主獨立，中國無理由加以干涉。	0.7263	-0.1568	0.6634	-0.2874
固有值	3.0093	1.0987	3.1601	1.1198
解釋變異量百分比	37.6	13.6	39.7	14.0
有效樣本數	903		1114	

交代本文分析的中國情與台灣心等核心概念的經驗內涵與變項的測量後，雖然本研究分析架構中其他變項的經驗內涵，皆可望文生義來理解，但仍須說明我們是如何來操作量化的測量。我們所謂「個人經濟評估」與「總體經濟評估」，乃是指受訪者以「目前」與「以前」來比較時（註八），分別從家庭經濟與整個台灣經濟狀況的角度，來表示「變比較好、差不多、或變比較不好」的看法。根據歐美國家的經驗研究顯示，個人家庭經濟的評估或整體社會的經濟評估，也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之一，只是這種經濟理性計算的因素對投票抉擇的影響效果，因不同的研究而有不同的發現：個人家庭經濟情況的評估，也就是所謂「個人荷包的投票」（pocketbook voting），影響效果比較有限，常被其他的因素所淡化，在不同的選舉中有不同的影響效果；而以整體社會經濟情況的評估，也就是所謂「社會經濟的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對於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則有較顯著的與跨選舉一致性的影響效果。（Kiewiet, 1983；Kinder and Kiewiet, 1979, 1981；Lewis-Beck, 1990）

近年來，台灣經濟的衰退、失業率的升高、國家的財政困難、產業的外移等等，不僅日常生活可以感受到、也是傳媒所一再提的新聞；這種情形不僅只是整體社會的經濟議題，也是個人家庭經濟的問題（註九）。雖然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甚至強調政治情感因素，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決定性；但是，我們也不能不兼顧日常生活上經濟考慮的理性因素，對於投票行為的可能影響。當然，從觀察個人家庭與整體社會經濟評估對投票行為的影響，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確認：究竟目前台灣的選舉是理性考慮比較多，還是感性成份比較重，抑或是兩者兼顧之。台灣選舉的符號政治，既然在於強調政治情感對選民投票抉擇的決定性效果，那麼也就是說：即使選民對於自己家庭與社會經濟的評估是悲觀的，而他們這種經濟上的理性考慮，只限於日常生活上的言談與抱怨而已，選舉投票時，依然以政治情感的因素來決定候選人的取捨—換句話說，台灣社會的選民在政治行動邏輯上，仍然被籠罩在中國結與台灣結所衍生的種種政治情感因素之下。考慮選民個人經濟評估與總體經濟評估的因素，就好像引進實驗上的對照組，以便來觀察實驗組，進而來確定我們的研究分析的變項、以及所衍生的論證，是否具有實質的因果關聯性。

當然，如上述，從中國結與台灣結衍生投射到實際政治層面上的另一心理傾向，就是民主化展開以來所並行的台海兩岸關係解凍之統獨立場、以及國家認同或選擇的問題。國家認同的測量方式，自吳乃德（1992）在「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一文發表以來，他所採用的兩道測量題，就成為被經常用來測量國家認同的量表題（註十）。（徐火炎，1996）這兩道題目是：「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關係，那麼台灣就應該獨立成爲一個新的國家」與「如果大陸和台

灣兩地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那麼兩岸就應該統一。」這兩道條件式的測量問題，所引導出來的回答，就態度的內涵而言，基本上是牽涉到贊成台灣與大陸統一或追求台灣獨立等，是涉及國家選擇的價值取向。就狹義的角度來說，這是指中國與台灣成為對等可能的兩個國家時的一種國家選擇；這也是國家認同心理之具體化表現，但畢竟與「國家認同」—這種比較抽象或從小就內化的「我們國家是什麼」之自明之理，具有意義上的不對等性。雖然如此，就本文分析的資料而言，並無較適切的測量方式；因此，本文以上述條件式測量題所觀察的內涵，在文中就以「國家認同（選擇）」一詞來加以指稱。

國家認同或選擇所指涉的心理特徵，如上述測量題所引導出來的態度反應，往往是用以推論背後「怎樣的或那一個國家」才是心理認定所歸屬或可欲的；換句話說，國家認同或選擇在信念體系的位階上，比較屬於心理底層的價值信念。相對來說，牽涉到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作為台灣前途的選項時，選民比較贊成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的意見，基本上就是指在「統一與獨立」兩極端的政治立場上，加以自我定位。這種測量方式所引導出來的心理反應，固然也是源自於集體潛意識的所謂中國結或台灣結心理、或上面所謂國家認同或選擇的價值。所以，本文將「統獨議題立場」視為是民衆對台灣與大陸關係可能走向等（無論是選舉或平時）議題之態度偏好。在1998年的資料蒐集上，以「國內對於台灣的前途（統獨）問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未來『台灣獨立』比較好；也有些人認為未來『兩岸統一』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怎麼樣」的測量題來詢問受訪者（答項從「很贊成台灣獨立」、「維持現狀」、到「很堅持兩岸統一」）。然而，在2001年的資料上，面訪調查的問題則稍有改變：以「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有儘快統一、儘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永遠維持現狀等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雖然，2001年的這種測量問題，把「時間（儘快）」的面向加以標示出來，但所測量選民在「統一與獨立」兩極端政治立場上的自我定位，與1998年的題目所測得的內涵比較，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換句話說，關於統一或獨立的議題，無論是快或慢，都指向於未來的發展，而「統獨議題立場」所測量的就是：選民的態度偏好在「統一與獨立」光譜上的定位。

此外，本文中政黨認同的測量則是以選民對政黨的「喜歡」（態度偏好）程度來測量。在1988年的資料中，測量題為：「對於（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這三個政黨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請問您喜歡或不喜歡的情況分別如何？」；而在2001年的資料中，政黨認同的測量則以0分（非常不喜歡）至10分（非常喜歡）的量尺分數，讓受訪者用於表示他們對各主要政黨（民進黨、國民黨、新黨、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等有代

表候選的政黨)的喜歡程度。本文中關於「族群認同」的概念,則指受訪者對於自我是「中國人、台灣人、還是兩者都是」的一種自稱與認定。最後,本文分析架構中所考慮的自變項,僅將以往選民投票發現具有影響作用的人口學上變項——選民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省籍等列入分析。當然,變項的選擇乃是根據研究分析的旨趣與策略而來,並無絕對的標準可言。這些常見的人口學上的變項,在測量上大致雷同,因此,為節省篇幅在此不贅述。

七、分析結果的說明與可能的解釋

首先,我們從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直接影響因素來看。無論是1998年的四屆立委選舉或2001年五屆立委選舉,選民投票對象都是多個參選政黨的候選人;因此,我們分析模型中的依變項——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基本上也是多類別的變項。以1998年的立委選舉而言,有分析意義的黨派投票抉擇有三類:民進黨、國民黨與新黨等;而在2001年的立委選舉時,由於新黨的得票率僅達2.88%,並不構成為有意義的分析對象;而剛剛組黨的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卻在初登選舉舞台之際,就分別獲得20.39%與8.52%的投票支持率,而成為在野的第三與第四大黨,實力僅次於國民黨(31.27%)與執政的民進黨(36.46%)。因此,就2001年立委選舉的資料而言,具有分析意義的黨派投票抉擇對象有: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與台聯黨等四類。既然分析的依變項是屬於不具順序、不連續的多元(polychotomous)類別變數;因此,本文也採用多元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t)的統計方法來進行分析。

在選舉行為的研究上,最主要的研究問題就是:影響選民投票給不同政黨候選人的因素是什麼。首先,我們就1998年的四屆立委選舉的選後面訪資料來分析。從表3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結果所顯示,以整個模型的「可能機率比的卡方值」(LR χ^2 , 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來說(註十一),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顯著變項乃是:教育程度、省籍、「台灣心—中國情」與選民對三個政黨(民、國、新等)的認同(偏好)心理;若以「虛擬決定係數」(pseudo R-square)與正確預測百分比的角度來看:在1998年四屆立委選舉時,從選民的教育程度、省籍、台灣心與中國情、以及他們對當時三個政黨的認同心理等,對於選民所以投票支持不同黨派候選人的變異量,就能提供36%左右的解釋能力。

就個別變項影響對黨派投票抉擇的關係來看,我們可從分析結果進一步加以說明。第一,在比較選民投票給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抉擇上,選民的國民黨認同心理影響最具決定性效果:選民對國民黨認同在測量單位上,假定增加一個測量單位,則他們投票給國

民黨的機率，與投票給民進黨的機率相比較，則增加3.95倍之多（ $4.95 - 1 = 3.95$ ）；選民認同民進黨的心理，若增多一個測量單位，投給國民黨候選人的機率則下降74%（ $1 - 0.26 = 0.74$ ）。其次，選民的台灣心與中國情心理，也是決定選民選擇支持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顯著因素：較具台灣心而中國情較淡薄的選民，較可能支持民進黨候選人；選民的台灣心情感多強烈（或說中國情變薄）一個測量單位，則投給國民黨候選人的機率則減少19%（ $1 - 0.81 = 0.19$ ）。至於其他解釋變項對支持國民黨或民進黨的黨派投票抉擇而言，則不具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存在。當時的國民黨在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領導下，一方面雖然極力倡導走向本土化，另一方面在選民心目中，國民黨仍然是追求中國統一的政黨。因此，國民黨與民進黨支持者之間，除了政黨認同、台灣心與中國情等心理，具有顯著的差異外，並不因為性別、教育程度、省籍、族群認同、國家認同（選擇）、統獨議題立場或經濟評估等因素之不同，而有顯著的差別存在。

表3 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1998年立委選舉）

解釋變項	國民黨 (n=513)		新 黨 (n=72)		LR χ^2 (df=2)
	Logit	Or	Logit	Or	
性別(男)	-0.026	0.98	-0.310	0.73	0.9553
年齡	0.012	1.01	0.007	1.01	1.9112
教育程度	-0.043	0.96	0.253	1.29*	6.0625
省籍(本)	-0.544	0.58	-1.405	0.25*	9.3050
族群認同(中)	-0.032	0.97	0.295	1.34	1.3201
台灣心—中國情	-0.207	0.81*	-0.343	0.71#	5.5759
國家認同(台)	-0.038	0.96	-0.061	0.94	1.3958
國民黨認同	1.598	4.95***	-0.159	0.85	108.0675
民進黨認同	-1.409	0.26***	-1.137	0.32***	75.6801
新 黨認同	0.137	1.15	1.685	5.40***	44.6666
總體經濟評估	0.059	1.06	-0.170	0.84	1.9132
個人經濟評估	-0.045	0.96	0.091	1.10	0.5245
統獨立場(統)	0.099	1.10	0.039	1.04	1.7160
常數項	1.059	---	-1.985	---	7.4482
Log likelihood	=	-503.58713			
Number of obs	=	886			
LR χ^2 (22)	=	564.84			
Prob > χ^2	=	0.0000			
Pseudo R ²	=	0.3593			
% Correctly Predicted	=	75.959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p = 0.055$ 民進黨 (n=301) 為基比類別。

第二，選民選擇投票給新黨或民進黨的決定因素，如表3的分析結果所顯示，主要取決於選民的教育程度、省籍、新黨與民進黨的認同因素。從這比較來看，也顯示1998年立委選舉時新黨選民與民進黨選民的異質性較大：不僅政黨認同的不同具有顯著的差異，同時選民的教育程度與省籍也極為不同。教育程度比較高的選民，投票給新黨的機率比投票給民進黨的可能性，每變化一個測量單位則高出29% ($1.29 - 1 = 0.29$)的機會。就省籍的差異而言，假定選民的籍貫是本省籍的，則他們去投新黨候選人的機率，只是投票給民進黨機率的25%而已。當然，比較認同新黨的選民自然傾向於投票支持新

黨候選人，而愈認同民進黨的選民也愈有可能投票支持民進黨候選人：選民認同新黨增加一個測量單位的變化，他們投票給新黨的機率卻是投票支持民進黨的5.40 (5.40/1) 倍；相反地，選民在政黨認同心理的測量增加一個單位，他們去投新黨的機率則減少68% ($1 - 0.32 = 0.68$)。

在一般的預期上，新黨被視為最主張中國統一的政黨，而且他們的領導菁英對國民黨的「獨台」傾向或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向來批評也不遺餘力，因此，選民的台灣心與中國情心理，應該是決定新黨與民進黨選票的分歧點。但是，從1998年立委選舉的實証資料來看，選民的台灣心與中國情心理，對於選民取捨民進黨或新黨的實際投票行為，並沒有太顯著的影響效果 ($\chi^2 : p = 0.055$)。這研究發現的一個可能解釋就是：選民的中國結或台灣結之心理，早已轉化到不同的政黨認同傾向上；因此，選民的台灣心與中國情心理對黨派投票抉擇的影響效果，被同時考慮進來的政黨認同因素所取代而沖淡，所以未達統計上傳統上的顯著水準。

總結而言，就1998年四屆立委時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行為來看，選民選擇國民黨、民進黨或新黨候選人的因素，主要是政黨認同心理（可以解釋三黨支持選民的差別），其次是選民的教育程度與省籍差異（只是用於解釋民進黨與新黨支持者的不同），最後才是選民從台灣心與中國情心理（可以解釋三黨選民的差別）。這研究發現與上述 Sears 與 Funk (1991) 對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符號政治」之研究發現頗為吻合；他們將政黨認同心理視為是選民的政治情感因素，以對照理性的自利考慮因素對投票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選民的政黨認同仍然是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最主要因素。在我們的分析架構中，如上述我們也將選民的個人經濟評估與總體經濟評估等因素考慮進來；但卻發現經濟評估的自利理性因素，對於選民在1998年立委選舉的黨派投票抉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作用。當然，這只是從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直接」影響關係或效果來觀察；以下，我們會回頭討論「中國情」與「台灣心」，對選民黨派投票抉擇具有「間接」的影響作用。換句話說，選民政黨認同心理的背後，實際上與他們的「中國情」與「台灣心」是息息相關的；選民的教育程度與省籍因素，也影響他們的「中國情」與「台灣心」之政治信念，進而導向或強化不同的政黨認同心理，最後也影響到黨派的投票抉擇。

接下來，我們以2001年的五屆立委選舉資料，來看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從表4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區隔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與台聯黨等不同政黨選票來源的因素，主要是選民年齡、教育程度、省籍、台灣心與中國情、政黨認同、及總體經濟的評估等差異。這些影響因素大致可以有效地解釋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總變異量的26.68%；其中，毫無疑問地以政黨認同的影響效果為最大，年齡

與省籍的差異次之，再來才是教育程度、台灣心與中國情等變項的影響效果。以表4中 LR χ^2 的數值來看，在具有顯著決定作用的變項中，相對來說，總體經濟評估的影響作用為最小。

表4 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2001年立委選舉）

解釋變項	國民黨 (n=363)		親民黨 (n=217)		台聯黨 (n=75)		LR χ^2 (df=3)
	Logit	Or	Logit	Or	Logit	Or	
性別(男)	-0.141	0.87	-0.143	0.87	-0.513	0.60 [#]	3.9598
年齡	0.020	1.02 ^{**}	0.003	1.00	-0.009	0.99	11.8576
教育程度	0.114	1.12 ^{**}	0.064	1.07	0.076	1.08	8.3699
省籍(本)	-0.727	0.48	-1.196	0.30 ^{**}	-1.258	0.28 [*]	12.0349
族群認同(中)	0.074	1.08	0.076	1.08	-0.222	0.80	4.5294
台灣心—中國情	-0.242	0.79 [*]	-0.219	0.80 [#]	-0.100	0.91	6.4135
國家認同(台)	-0.015	0.99	-0.042	0.96	0.025	1.03	0.4344
國民黨認同	0.363	1.44 ^{***}	0.035	1.04	0.037	1.04	54.0037
民進黨認同	-0.448	0.64 ^{***}	-0.485	0.62 ^{***}	-0.421	0.66 ^{***}	69.8860
親民黨認同	0.058	1.06	0.466	1.59 ^{***}	-0.071	0.93	67.3510
台聯黨認同	-0.006	0.99	-0.084	0.92	0.217	1.24 ^{**}	12.2038
總體經濟評估	-0.312	0.73 [*]	-0.066	0.94	0.054	1.06	5.0161
個人經濟評估	-0.321	0.73	-0.069	0.93	0.151	1.16	5.4601
統獨立場(統)	0.059	1.06	0.071	1.07	-0.188	0.83	1.5469
常數項	-1.324	---	-0.198	---	2.217	---	7.1076
Log likelihood	=		-1008.7805				
Number of obs	=		1119				
LR χ^2 (22)	=		733.98				
Prob > χ^2	=		0.0000				
Pseudo R ²	=		0.2668				
% Correctly Predicted	=		63.717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p = 0.051$ 民進黨 (n=646) 為基比類別。

從表4的分析結果中，可進一步說明研究發現如下：第一，政黨認同乃是決定選民

2001年立委選舉黨派投票的最主要因素，選民對一個政黨表示偏好的一個測量單位變化，則傾向於投票給該黨的機率都比支持其他政黨立委候選人的機率，至少多24%（以民進黨與台聯黨兩個選前即倡導聯合政府的友黨來比較， $1.24 - 1 = 0.24$ ）以上，甚至高達59%的機率（以民進黨與親民黨比較時， $1.59 - 1 = 0.59$ ）。第二，年齡的顯著影響效果，主要發生在選民決定投票支持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候選人的比較上，如表4的分析結果所顯示，年紀愈大的選民愈可能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選民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投國民黨票比投民進黨票的機率，大概多出2%左右。第三，省籍的差異也是構成選民投票給不同政黨候選人的決定因素：假定本省籍的選民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機率是1時，投票給國民黨的機率則只有48%、投親民黨候選人的機率為30%、投台聯黨的只有28%；其中，最顯著的差異來源，則出現在民進黨與台聯黨的比較上。第四，台灣心與中國情變項的顯著影響效果，主要是出現在民進黨選民與國民黨、親民黨等支持者的比較上；亦即，選民愈具有台灣心的心理傾向，顯著地愈可能支持民進黨而非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候選人；假定選民在台灣心變項測量上增加一個測量單位的變化，增加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機率為1，則對國民黨的投票支持機率則減少21%（ $1 - 0.79 = 0.21$ ）、投票支持親民黨候選人的機率也減少了20%（ $1 - 0.80 = 0.20$ ）。此外，性別的可能顯著差異（ $^* : p = 0.051$ ）只出現在民進黨選民與台聯黨選民的比較之上，換句話說，在民進黨與台聯黨的比較中，男性選民可能比較傾向於支持民進黨的立委候選人。

最後，同時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發現，就是總體經濟評估對選民黨派投票的影響效果。表4的分析顯示，選民對台灣社會總體經濟的評估態度，對民進黨與國民黨的選票競爭，的確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作用：選民對總體經濟的評估愈樂觀——認為比較好，則比較支持民進黨；反之，認為總體經濟情況比以前差的選民，則比較支持國民黨；在總體經濟評估上一個測量單位增量或減少的變化，影響民進黨或國民黨投票支持的機率幅度達27%（ $1 - 0.73 = 0.27$ ）左右。這研究發現值得關注的是，以往在台灣各層級的選舉中（即使在1998年立委選舉時，台灣經濟已經出現明顯的衰退），選民對經濟的評估態度，向來都不是他們黨派投票抉擇的考慮因素；而在2001年的立委選舉中，選民對台灣經濟總體的看法，卻成為影響他們黨派投票抉擇的一個顯著因素。

自2000年總統選舉而開啓政權輪替的大門後，選民對經濟情況的好壞歸因與政黨責任歸屬等關聯性，或許有比較清楚地了解。因此，選民的經濟評估態度或滿意程度，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也開始發生顯著的影響作用；當然，這種「經濟投票」（economic voting）的現象，是未來台灣選舉投票行為可繼續觀察研究之處。此外，這研究發現也可以印證歐美選舉研究的發現：選民對總體經濟的評估對黨派投票行為具有較大的影響作用，而個人經濟的因素反而不會成為他們黨派投票的考慮因素。

從1998年與2001年兩筆資料的分析結果中，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在立委選舉的大選區與採行「SNTV」(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的選舉制度下，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主要是選民的政黨認同，其次才是省籍背景、教育程度、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心理，再來才是選民的年齡、性別與經濟的評估態度等變項。上述兩筆立委選舉的資料分析結果，若與以往投票行為的研究加以比較，則我們可以發現：首先，在過去的研究中，「我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的族群認同變項，在1998年的台北市長與2000年總統等選舉時，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具顯著的淨影響效果(徐火炎，2001、2002)；但在這兩次立委選舉的資料基礎上，並未獲得支持。這主要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因為首長選舉與民意代表選舉的不同，而可能產生的差異：在單一選票簡單多數決選舉制度下的首長選舉中，選民投票對象的候選人與政黨是同一的，而在現行SNTV選舉制度的民意代表選舉中，選民投票對象的候選人，只是同黨競爭中的一個而已；因此，在民意代表選舉上，我們所指稱的黨派投票抉擇，只是在候選人共通的政黨屬性層次上而言；對不同的選民而言，雖然投的都是同一政黨的票，但卻可能是分屬不同族群的同黨候選人。所以，族群認同變項對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淨影響效果，相對而言就可能變為不彰顯。然而，比較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將「台灣心—中國情」的變項考慮進來，則族群認同的差異性，不僅反應在政黨認同上，也被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心理所取代，以致於變成不具顯著性作用。

其次，國家認同(選擇)與統獨議題立場的變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常被發現是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顯著因素，(吳乃德，1992；陳文俊，1995；徐火炎，1996、2001；盛杏媛，2001)；如同上述，在本文的分析結果中，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對選民黨派投票抉擇具有淨影響作用的發現，也未能獲得經驗資料的支持。當然，這種研究發現的不同，絕不是因為不同的選舉所產生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的研究分析中考慮進來「台灣心—中國情」的變項，而這反映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文化叢結心理，其實已經涵蓋它們比較具體化地表現在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等信念與態度；因此，一旦我們同時考慮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台灣心—中國情」的變項時，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等變項，對於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的淨影響關係，就被取代或沖淡而不具顯著性效果。

八、中國結、台灣結與中國情、台灣心：台灣符號政治的內涵

從上述分析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各種可能因素中，我們除了發現選民對台灣社會的總體經濟評估態度，在政黨輪替的民主鞏固時期中，開始成為選民選擇政黨候選人

的影響因素之一，同時，這研究發現也佐證歐美的研究結果：認為選民的「經濟投票」，主要是出於整體社會經濟的衡量，而很少源自於個人荷包之經濟利益的理性計算。這種開始萌芽的「經濟投票」情形，是否就暗示著台灣政黨的選舉競爭已經朝著「拼施政與比政策」的方向去動員選民？而台灣選民的投票抉擇也必然慢慢地轉向於議題取向？曙光與希望總是美好的前提，然而承認事實卻是務實的必要條件。從我們的資料分析中，很顯然地可以看出，環繞著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各種政治情感因素，仍然是構成為選民政治思考與取捨政黨候選人的決定因素。如上所述，政黨偏好的認同情感乃是左右選民投票支持一個政黨候選人的最主要因素，以 Sears 與 Funk (1991) 的看法而言，這種以政黨感情來投票的現象，也就是他們所謂的「符號政治」。從多元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中，說明了那些變項是1998年與2001年兩屆立委選舉中「決定黨派投票抉擇因素」；接下來，我們感到興趣的研究問題就是：哪些變項可以用來解釋選民在「決定黨派投票抉擇因素」上的差異。換句話說，選民依據作為黨派投票抉擇的「台灣心—中國情」信念、政黨偏好的認同心理、及總體經濟的評估等，究竟受到哪些人口學上的因素或其他心理的條件所影響？

如上述資料所顯示，選民的國家認同（選擇）、個人經濟的評估、統獨議題立場等，雖然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不具統計上顯著的影響作用；但選民的這些政治心理取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與重要性；因此，探討分析選民大眾為何在這些政治心理取向上具有差異，也是我們藉以觀察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焦點之一。基本上，本文以下的分析就是嘗試說明台灣符號政治所環繞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內涵；換句話說，我們不僅可以觀察到「台灣心—中國情」變項對選民黨派投票抉擇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更可以發現它是連接省籍、族群認同等客觀上與主觀上的「原鄉」集體潛意識，進而對國家認同、政黨認同、統獨議題立場、甚至選民對個人與總體經濟的評估等因素，構成顯著的影響作用，最後導向於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形成所謂的間接影響效果。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我們以下分析架構中的依變項，則從圖1的黨派投票抉擇往前移動，而以選民的個人經濟評估、總體經濟評估、政黨認同心理、國家認同（選擇）、統獨議題立場等為依變項，來進行因果模型的設定與分析。由於這些變項的測量性質或量化轉化後，都至少在具有次序測量的「準」等距之水準上；因此，在 robust 統計分析假定的基礎上（註十二），我們採用最大概似推估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與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的方法，來進行變項之間因果關係的探索性分析（註十三）。以下，我們以列表的方式（以橫行為解釋變項、直列為依變項）來說明上述因果模型的影響關係。

首先，以1998年立委選舉的資料來看，如表5的路徑係數所顯示，我們的研究發現

可以說明如下幾點：第一，選民的台灣心與中國情心理，主要在於反應（或說取決於）省籍的差異與不同的族群認同：本省籍與「我是台灣人」自稱的選民，傾向以強調台灣本土情感為主。第二，選民的國家認同（選擇）的不同，基本上是受到族群認同、以及台灣心與中國情等心理所決定。第三，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比較傾向於認同國民黨；同樣地，自稱是中國人的、較具中國情感的選民，也較具有國民黨的認同感。第四，男性的選民、年紀較輕與本省籍的選民，比較認同於民進黨；同時，自稱是台灣人的、強調台灣本土感情的、認同台灣為獨立國家的選民，也比較會認同民進黨。第五，教育程度較低的、外省籍的選民，較具有新黨的認同傾向；然而，自稱是台灣人的選民，則比較不會認同新黨。第六，選民的總體經濟評估，主要是受到國家認同的影響：以傾向於台灣為獨立國家認同的選民，對台灣整體經濟的評估，持著比較樂觀的看法，而認為情況會比較好。第七、選民在個人經濟評估上的差異，主要是因教育程度、台灣心與中國情的不同而來：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中國情感較強烈的選民，傾向於認為個人的經濟情況會比以前好。最後，選民在統獨議題的立場上，受到選民的中國情與台灣心、國家認同、國民黨認同、民進黨認同、以及總體經濟評估等因素所影響：較具中國情的、傾向於中國認同的、認同國民黨的、以及總體經濟評估樂觀的選民，較傾向於持著贊同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的立場。

表5 路徑係數（1998年立委選舉資料）

	台灣心— 中國情	國家認同 (台)	國民黨 認同	民進黨 認同	新黨 認同	總體經 濟評估	個人經 濟評估	統獨立場 (統)
性別(男)				0.064				
年齡			0.181	-0.069				
教育程度			-0.089		-0.082		0.149	
省籍(本)	0.227			0.116	-0.086			
族群認同(中)	-0.464	-0.081	0.126	-0.142	-0.243			
台灣心—中國情	----	0.495	-0.175	0.216			-0.138	-0.445
國家認同(台)		----		0.074		0.086		-0.236
國民黨認同			----					0.082
民進黨認同				----				-0.077
新黨認同					----			
總體經濟評估						----		0.056
個人經濟評估							----	
R-square	0.320	0.293	0.131	0.180	0.084	0.007	0.043	0.444

表中所列數值為標準化路徑係數，皆達統計上0.05以上顯著水準。

其次，再以2001年立委選舉的資料分析來看，如表6的路徑係數所顯示，我們的研究發現如下：第一，選民的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心理，主要是取決於省籍與族群認同的因素：本省籍的、自稱是台灣人的選民，傾向於強調台灣本土的感情。第二、女性的、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比較傾向以台灣為獨立國家的認同；同時，自稱是台灣人的、具有台灣心情感較強烈的選民，也較不會以中國為國家認同。第三、年紀較大的選民、外省籍的選民，較傾向於國民黨認同；自稱是中國人的、具中國情較強烈的、以及傾向以中國為國家認同的選民，也比較可能認同國民黨。第四，男性的、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比較可能認同民進黨；同時，自稱是台灣人的、強調台灣本土情感的、以及以台灣為國家認同的選民，也較認同民進黨。第五，年紀較輕的、外省籍的選民，較認同親民黨；而自稱是中國人、強調中國情感的、及以中國為國家認同的選民，也比較傾向於認同親民黨。第六，對台灣團結聯盟表示比較偏好的，乃是男性的、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同時，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強調台灣本土情感的、以及以台灣為國家認同的選民，則較可能对台聯黨表示偏好。第七，選民對台灣總體經濟評估的不同，主要是受到族群認同與民進黨認同的因素所影響：看好台灣整體情況的，往往是自稱台灣人的以及傾向於認同民進黨的選民。第八，選民的個人經濟評估態度，則因年齡、教育程度、族群認同、中國情與台灣心等因素而有別：年齡較大的選民、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對個人的經濟狀況持著比較樂觀的態度；同樣地，自稱是台灣人的、強調台灣本土情感的選民，也傾向於認為他們家庭的經濟狀況比以前要好。最後，選民對統獨議題的立場，受到族群認同、中國情與台灣心、國家認同、親民黨認同、台聯黨認同與總體經濟評估等因素所影響：自稱是中國人的、強調中國情的、以中國為國家認同的選民，也比較贊成台灣與中國統一的立場；親民黨認同較強烈的、對台聯黨較不偏好的、以及認為台灣整體經濟變壞的選民，也傾向於贊同台灣與中國統一的議題立場。

表6 路徑係數 (2001年立委選舉資料)

	台灣心— 中國情	國家認同 (台)	國民黨 認同	民進黨 認同	親民黨 認同	台聯黨 認同	總體經 濟評估	個人經 濟評估	統獨立場 (統)
性別(男)		-0.067		0.078		0.060			
年齡			0.073		-0.093			0.077	
教育程度		-0.059		-0.115		-0.099		0.299	
省籍(本)	0.147		-0.064	0.163	-0.146	0.107			
族群認同(中)	-0.471	-0.067	0.119	-0.168	0.110	-0.118	-0.117	-0.079	0.082
台灣心—中國情	---	0.571	-0.267	0.290	-0.311	0.273		0.099	-0.309
國家認同(台)		---	-0.079	0.074	-0.125	0.123			-0.239
國民黨認同			---						
民進黨認同				---			0.178		
親民黨認同					---				0.067
台聯黨認同						---			-0.083
總體經濟評估							---		0.050
個人經濟評估								---	
R-square	0.286	0.384	0.186	0.304	0.284	0.248	0.062	0.088	0.375

表中所列數值為標準化路徑係數，皆達統計上0.05以上顯著水準。

從上述兩筆資料的路徑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省籍、族群認同、台灣心與中國情、以及國家認同等因素，不但是決定政黨認同（偏好）的「主要因素」，同時也與政黨認同共同決定選民的總體與個人的經濟評估態度、統獨議題的立場，最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從觀察「決定黨派投票抉擇諸因素」背後的影響因素中，如上表5與表6的路徑分析結果，可以說明為何有些以往被視為解釋黨派投票抉擇的變項，例如：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等，在我們引進「台灣心—中國情」的變項之後，影響效果就被取代或沖淡掉。此外，值得一提的發現就是：上述指出選民對總體經濟評估的態度，對國民黨與民進黨選票，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然而在表6中，我們也發現選民對台灣整體經濟看好或看壞的態度，實際上是受到族群認同與民進黨認同等變項所決定；這也說明自稱是台灣人的、與傾向於認同民進黨的選民，對台灣整體的經濟抱持較樂觀的看法，同時在2001年立委選舉時較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相反地，自稱是中國人的選民，較不認同民進黨的選民，對台灣整體的經濟情況持著較悲觀的看法，而在立委投票時則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候選人。

當然，選民的經濟評估態度與投票行為，並非本文研究設計與分析的主軸焦點，因

此，以表5與表6的決定係數（R-square）來看，我們分析模型中所考慮的解釋變項，對於選民在個人與總體經濟評估態度為何差異，能提供的解釋是極為有限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比較1998年與2001年的資料加以說明：首先，選民的總體經濟評估，都受到政黨認同因素的影響；當國民黨執政時期，國民黨認同感較強烈的選民，傾向於認為總體經濟狀況變得比較好；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民進黨認同感較強烈的選民，則對總體經濟上滿意感則較高。其次，兩筆資料的分析結果都顯示，選民的台灣心與中國情心理，對他們的個人經濟評估態度具有影響，但影響方向卻相反：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選民的台灣本土情感愈強烈，愈傾向於看壞他們個人經濟的情況；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選民的台灣本土情感愈強烈，則愈認為他們個人的經濟情況會變得更好。

既然，我們的分析模型是針對探討「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政治情感」因素而設，從表5與表6的決定係數來看，可說本文所考慮的解釋變項，皆頗具有效性。表中所列具有路徑係數（即具有統計上0.05顯著水準以上）的自變項，對於台灣心—中國情、國家認同、國民黨認同、民進黨認同、新黨認同、親民黨認同、台聯黨認同、以及統獨議題立場等依變項的理解，就以分析個體層次的資料而言，除了新黨的認同變項之外，可說都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此外，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發現，選民對各個政黨偏好的認同心理、以及他們對統獨議題的立場態度，主要是都受到省籍、族群認同、台灣心—中國情、國家認同等因素所影響決定。從這些影響因素對不同政黨認同心理的決定效果來看，以「台灣心—中國情」的影響作用為最大且一致。在新聞媒體與民衆日常生活的對話中，一旦提起「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辭彙，上述這些影響因素也很自然成為他們在引申或論述的參考點。換句話說，這些影響政黨認同偏好傾向的因素，也是一般習慣被用來理解「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指涉內涵；因此，中國結與台灣結的集體潛意識心理，也間接或直接地反應在選民對不同政黨的認同感上。由此看來，選民與政黨之間的心理聯繫既然具有這樣的性質，那麼政黨之間的競爭與群眾動員，動不動就訴諸於族群認同、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心理情感，最後牽動「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對立，則是可想見的結果。

上述所謂決定政黨認同偏好的「主要影響因素」：省籍，族群認同、台灣心—中國情、國家認同等，除了省籍變項是以父親籍貫為測量的客觀因素外，其他的變項都可說是政治心理的變項。這些變項中，除了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兩個變項之外，都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這些性質上屬於政治心理的變項，不僅是研究台灣選舉投票行為學者都會考慮的解釋因素，也是上述證實對台灣選民黨派投票抉擇具有影響作用的主要變項。我們進一步對這些變項，及選民對統獨議題的立場態度等，進行統計上的因素分析，以觀察背後共通性的因素結構。分析的結果如表7所顯示的，省籍

與上述政治心理的變項，可區分出兩個環繞著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因素。

表7 中國結與台灣結（因素分析）

	1998年立委資料		2001年立委資料	
	台灣結	中國結	台灣結	中國結
省籍（本）	0.6541	0.0376	0.5374	-0.0856
族群認同（中）	-0.4690	0.5063	-0.4445	0.4755
台灣心	0.8643	0.0401	0.7606	-0.1412
中國情	-0.0364	0.8286	0.0980	0.8744
國家認同（台）	0.6076	-0.3280	0.3990	-0.6259
國民黨認同	-0.0608	0.6157	-0.4721	0.3684
民進黨認同	0.4386	-0.3707	0.7447	-0.2056
新黨認同	-0.3852	0.1596	----	----
親民黨認同	----	----	-0.6239	0.3293
台聯黨認同	----	----	0.7257	-0.1563
統獨立場（統）	-0.6178	0.4634	-0.3564	0.6276
固有价值	3.1652	1.1366	4.0593	1.1091
解釋變異量%	35.2	12.6	40.6	11.1
有效樣本數	888		1091	

假定我們所理解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等文化叢結的集體潛意識，表現在政治面向的意涵雖然以「中國情」與「台灣心」的價值信念為主體，但仍具有外延的意義內涵，則從因素分析的結果，可以大致上看出省籍、族群認同、中國情與台灣心、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統獨議題立場等變項，的確環繞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主軸上。我們指出台灣符號政治的現象，固然一方面在於說明台灣選舉投票的行為，甚至選舉競爭的種種訴求、或政治菁英的問政風格等，都受制於政治感情因素的影響或決定；另一方面則在於確認主導台灣選民黨派投票抉擇，以及選民政黨認同、甚至在總體與個人經濟情況的評估、對統獨議題的立場等，都糾纏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對立之上。

這種對立與糾葛的情形，可見附圖1與附圖2因素分析的座標圖示，這只是將表7中各變項的因素分數值標示於平面座標，以利目視的觀察。從附圖1的座標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情」是把「中國結」因素拉高分數的最主要變項，而「台灣心」則是把「台灣結」因素分數推高的主要變項。中國情與台灣心的這種「催化與黏劑」的作用，在我們分析的兩筆資料上，都相當一致；這也就是說，經驗個體層次上的中國情

與台灣心之價值信念，是集體層次上「中國結與台灣結」集體潛意識之可觀察的核心內涵。

從這因素分析的結果中，我們把中國情、族群認同、國民黨認同、新黨認同、及統獨議題立場等變項的內在共通性特質，就命名「中國結」；同時，以省籍、台灣心、國家認同、民進黨認同或台聯黨認同等變項所共通的內涵，稱為「台灣結」。這是本文對「中國結」與「台灣結」等文化叢結概念，在經驗資料上加以重新組合的指涉內涵。希望藉由這樣的處理，能夠讓具有文化叢結性質的「中國結與台灣結」概念，能透過實証資料的研究分析，獲得比較清楚了解與定性。那麼，台灣選舉的符號政治以及政治情感的選舉動員，為何都纏繞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對立上，其中的緣由就不難理解。

九、結論

上述中，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或許多於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有意義而值得觀察的問題，往往是後續研究的動力來源。上述，我們以直接或間接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政治心理變項，以及省籍背景的社會人口屬性變項，透過因素分析的資料簡化，把其中的內在共通結構確認出來，分別命名為經驗層次上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心理。由此組合過程中，我們可以理解到集體層次上文化叢結性質的「中國結」與「台灣結」之集體潛意識概念，在個體層次的經驗世界中，乃是分別以「中國情」與「台灣心」價值信念所主導的、具有「併發症」(syndrome)性質的心理特質。

當然，我們都是在前人的引導中學習，也許不一定是踏在巨人肩上往前看，但一定是循著先驅者的腳步往前走。本文的分析，即是根據胡佛發展的、關於「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測量為基礎，而以「中國情」與「台灣心」來指稱個體層次上所觀察到的心理特性。本文從解析與組合的方式，首先說明中國結與台灣結在台灣社會的凸顯性，進一步從經驗資料來分析相對應的、所謂「中國情與台灣心」的政治心理特徵。同時，透過比較1998年與2001年兩筆橫跨政黨輪替執政前後的選舉調查資料分析中，我們除了發現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心理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具有淨影響作用之外，也發現它是貫穿其他影響變項對選民投票行為發生作用的重要因素。最後，本文將這些與台灣心、中國情具有密切影響關係的變項，透過因素分析再加以組合，嘗試拼湊出我們在政治面向上所謂「中國結」與「台灣結」所指涉的個體層次上「併發症」心理的實質內涵。

「中國結」與「台灣結」這種具有文化叢結性質的概念，雖然缺乏明確的定義，卻是傳播媒體與一般日常生活對話中，被視為是當前台灣社會涉及到政治性好惡情緒、評

是傳播媒體與一般日常生活對話中，被視為是當前台灣社會涉及到政治性好惡情緒、評價與情感的參考點。本文的研究與資料分析，不僅在說明這種現象，也在經驗上賦予它實質的指涉內涵。以政治情感為主要動力的政治參與或選舉投票行為，無論是被稱之為「表意的」或「符號的」政治，既然普遍存在於歐美社會，台灣自不例外，反而更為凸顯。如上述，以情感為訴求動力的符號政治，在台灣社會不但具有「中國」與「台灣」為「原鄉」集體潛意識的特殊內涵；而且，這種以中國結與台灣結為對立的選舉情境，更引導台灣選舉競爭中符號政治的深化與轉向。符號政治的深化結果，使得台灣的選舉競爭必然朝著刺激選民的政治情感與情緒，以作為選民動員的手段。當然，其中最有效的刺激原就是挑動選民心理底層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對立。

這樣具有「原鄉」或「原型」性質的集體潛意識，一旦被激發挑動，它必然逐漸脫離理性的思考，而帶動政治過程或選舉競爭在「狂熱度」與「焦慮度」的升高。選舉競爭中符號政治的轉向，則是指選舉動員的手段一直強調糾纏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主軸上，以誘發與激化「中國」與「台灣」為想像中沒有交集的「原鄉」或「原型」。然而，這樣的選舉競爭過程，必然會逐漸模糊掉選舉競爭之政治目的何在。一種可能的結果就是，政黨的選舉競爭傾向於誘導選民，以政治情緒與政治上的好惡情感，而不是以現在政績與未來政策的良窳，來取捨黨派候選人的投票支持。另一種結果就是，選民在選舉投票上，重點不在於「把流氓掃地出門」（throwing the rascals out），以選擇有大作為的政府與有能力的政治領航人（Miller and Wattenberg, 1985）；相反地，卻將投票取捨的焦點擺在政治情緒上：哪位候選人最能打動或滿足「我的心情、情緒或情感」。

上述符號政治的深化與轉向之互相交織的發展趨勢，就構成相激相盪的當前台灣政情與選舉的情境：在眾多缺乏批判精神的傳播媒體幫腔之下，政治人物爭相圍繞在宣洩政治情緒，以及挑動對立政治情感為主題上面進行口水戰，以滿足媒體的採訪；最終，卻忘記政治競爭的實質應該落實在「端出牛肉」的構想與政策上。當然，這只是從我們的研究發現中，引申到觀察現實政治過程的一種具侷限性之看法。如上述，在我們的研究分析中也指出，選民對總體經濟評估之理性因素，仍然對他們的黨派投票抉擇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這種以理性因素投票的新近發展，是健康民主政治所預設的功能；因此，只要民主政治過程不要被政客所利用，以致於開倒車而走向以民主形式包裝的威權政治；或者說選民的政治水平逐漸提高，以理想與務實兼顧的步調慢慢往前走，那麼台灣選舉政治的遠景，就不會被用命定悲觀的筆法去描繪，色彩也會較為清楚明亮。

從選民認為選舉的過程與結果對他們具有影響的角度來看，我們即可印證台灣選舉

中符號政治與頻繁動員政治情感的可能發展。以表8的統計結果顯示，我們從選舉對民衆心理的衝擊與影響來看，當然，選舉既然是民主政治過程的必要條件，選舉的正常功能自然也會受到選民的肯定，例如，1998年的資料顯示，在認為有影響的選民之中，肯定該次選舉會帶動民主進步的比率雖然並沒有太高（47.2%），但認為當次選舉會擾亂政治安定的比率也相對較少（30.4%）。然而，在2001年時，絕大多數表示選舉對他們具有衝擊與影響的選民，都認為選舉會帶動民主進步（75.6%）；同時，認為該次選舉會促進政治安定的也佔多數（62%）。這是衆所樂見的良性發展方向。

如上述所說，長久以來台灣的選舉競爭過程，無論是政黨為主導的或是候選人單打獨鬥的選情，他們的選舉策略都跳不開「中國結」與「台灣結」對立的選舉訴求。從表8的資料統計所顯示，就可察覺到選舉衝擊的選民之中，無論是認為選舉激化省籍對立、增強台獨意識、減弱統一意識或動搖一個中國的意識等感受，就1998年與2001年來加以比較，增加的幅度都非常大。首先，認為該次立委選舉激化省籍對立的比率，從1998年的24.3%增加為2001年的54.5%。其次，以1998年的資料而言，表示有感受衝擊或影響的選民中，認為選舉會增強台灣當家作主意識的比率僅佔44.7%；然而，在2001年的資料中，有受到選舉衝擊的選民當中，認為選舉增強民衆的台獨意識之比率卻高達75.0%。最後，認為選舉衝擊會動搖一個中國的觀念的選民比率，在1998時僅達24.0%，但到了2001年時，高達64.9%比率的有感受到衝擊之選民，會認為該次選舉減弱台灣與中國統一的意識。選舉對選民所構成的這種影響，也顯示出台灣的選舉過程，有趨向於強調「省籍分歧」、「台灣本土」與「統獨議題」的焦點，作為動員選民的訴求。這也指出台灣的選舉情境中，愈來愈充斥著牽動「中國結」與「台灣結」對立的感性訊息；而理性上的政策辯論與施政的檢驗，不是被擺在次要地位，就是成爲包裹中國結與台灣結引發的對立政治感情。

表8 選舉對選民心理的影響與衝擊

	1998年選舉	2001年選舉
	%	%
促進省籍和諧	----	38.7
激化省籍對立	24.3	54.5
有效樣本	342	1004
增強民衆台獨意識*	44.7	75.0
減弱民衆台獨意識	----	19.9
有效樣本	342	929
增強統一意識	----	30.4
減弱統一意識**	24.0	64.9
有效樣本	338	842
帶動民主進步	47.2	75.6
造成民主倒退	----	17.9
有效樣本	343	1275
促進政治安定	----	62.0
擾亂政治安定	30.4	30.6
有效樣本	342	1223

表中有效樣本指的是認為具有「影響」或「衝擊」的總人數

* 1998年的測量題是「動搖一個中國的觀念」。

**1998年的問法是：「增強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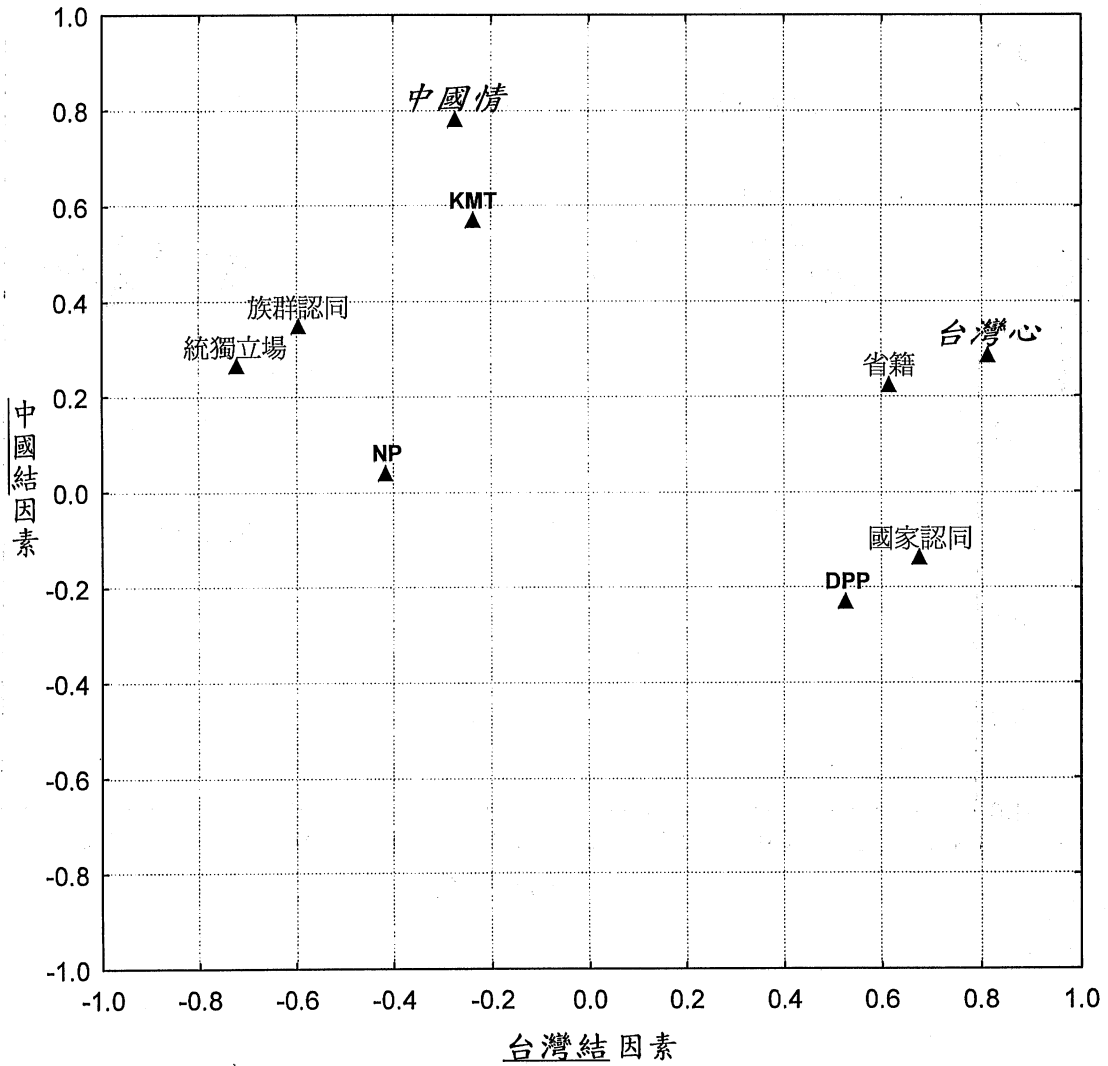
這種糾纏著「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對立而衍生的政治感情或情緒，如上述資料分析結果所顯示的，對選民群體而言，不僅只是表現在黨派投票抉擇的差異上而已，同時也牽連著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分歧。台灣這種聚焦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矛盾上的選舉競爭，不僅只是「符號政治」的現象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符號所指涉的政治情感，基本上是以「中國」與「台灣」的「原鄉」集體潛意識之認同為分野。這樣的符號政治與政治情感的選舉動員，假定演變成爲不歸路的趨勢，台灣選舉的最後戰場，可能就會陷於民族與國家重構的泥沼中，而非只限於政權更替的戰線上而已。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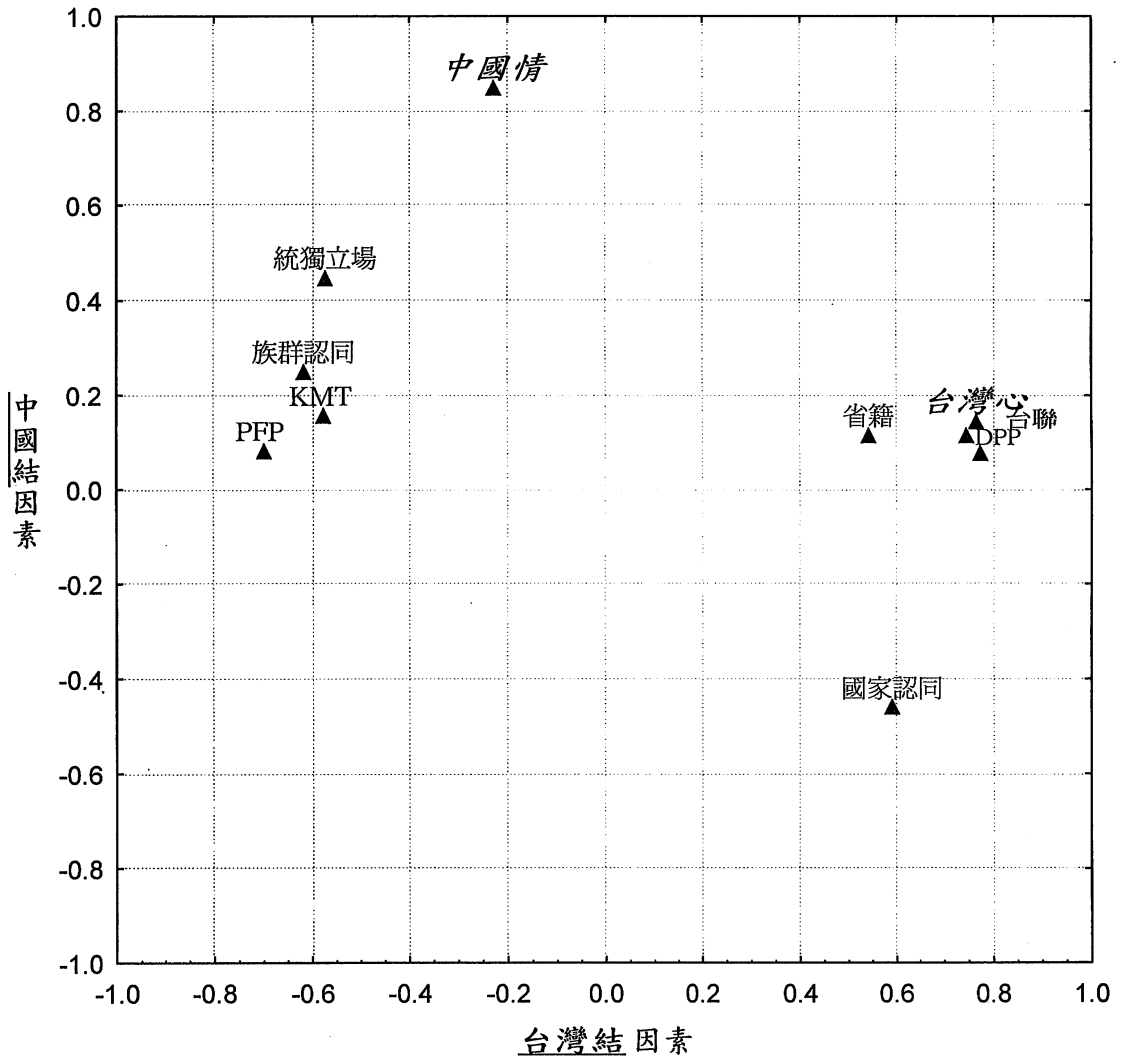
投稿日期：91.10.28，修改日期：93.08.26，接受日期：93.09.25。

附錄一

附圖1 台灣結與中國結
(1998年立委選舉資料)



附圖2 台灣結與中國結
(2001年立委選舉資料)



註 釋

- 註 一：Stimson 自承是借用 Walter Lippmann 在 *Public Opinion* (1922) 一書中的話。
- 註 二：George E. Marcus 等人指出，這是 Norbert Schwarz and Gerald L. Clore (1996) 的說法；同時，他們也不甚贊同這種區別。
- 註 三：除了本文所援引的文獻之外，最近的一本專著當以 George E. Marcus 等人 (2000) 的「情感智力與政治判斷」(*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一書為代表，而 James H. Kuklinski (2001) 主編的「公民與政治：政治心理學的觀點」(*Citizen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一書中，亦有豐富而深入的章節加以討論。
- 註 四：政治風格 (*political style*) 的概念，早在 Sidney Verba (1965: 544-550) 談政治文化時，就以政治信念，尤其是強調評價性信念的角度，來加以界定；而作者所謂「評價的信念」(*evaluative beliefs*)，也就是政治情感表現方式集結而成的。本文作者將文化與信念表現在政治過程中的整體結構，與政治情感因素連結起來論述，主要是受惠於胡佛以「政治風格」來指稱政治文化中「過程文化」(*process culture*) 而來的啟發。
- 註 五：「原型」的指涉比較偏重於集體潛意識的想法與記憶形式，但我們所謂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則較強調在「地理上」生活經驗所形成的文化內涵之集體潛意識。因此，Jung 的「原型」，在我們使用到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意義上時，以具有地理上家鄉意義的「原鄉」來指稱，或許更為貼切。以下，「原型」與「原鄉」交互使用，意義上並不特加區分。
- 註 六：「中國結與台灣結」在其他的用語上，也被稱為「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本文並沒有特意將兩者加以區別。在 Jung (1971) 心理學分析的學術傳統中，「情結」所指的是「潛意識」(*unconsciousness*) 的心理現象，與「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等具有自覺性質的「意識」(*consciousness*) 之辭義，在表面上似乎相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無論是潛意識的情結、還是帶有自覺意涵的意識等可觀察或測量的心理特徵，基本上可說都衍生自 Jung 所謂的文化內涵中「集體潛意識」的心理「原型」。
- 註 七：先後參與主持或協同主持這小組所執行一系列選舉研究計畫的成員同仁包括：胡佛、陳德禹、吳乃德、朱雲漢、徐火炎、陳明通、游盈隆、梁雙蓮、洪永泰與黃秀端等教授。

- 註八：1998年的資料以「一年來」與「過去幾年」相比來問，而2001年的資料則以「現在」與「一年前」相比來問；雖然在時間的參考點問法上有別，但在測量的實質內涵上是相當的。
- 註九：這可從「個人經濟評估」與「總體經濟評估」兩變項之間關係來理解，無論就1998年 ($r=0.457, p < 0.001$) 或2001年 ($r=0.271, p < 0.001$) 的資料來說，兩者之間都具有統計上高度顯著的相關關係。
- 註十：在參考書目關於徐火炎的不同各篇文中（1996、1999、2001、2002），都以這兩道測量題來操作化民衆的「國家認同」。
- 註十一：「可能機率比的卡方值」（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乃是指多元迴歸分析中，每個解釋變數對於整個多元迴歸模型具有顯著差異的貢獻程度；這類似一般最小平方迴歸分析中，每個預測變項對依變項所能提供相對解釋力的大小，亦即：排除測量單位不同的而產生的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 Coefficient）。但，在類別變項（無論是二元或多元）的邏輯迴歸分析中，我們無法直接以邏輯估計值（logit estimate）或機率比值（odds ratio），來比較解釋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大小，而只能透過「可能機率比的卡方值」的大小來比較：一個解釋變項的可能機率比的卡方值愈大，對於依變項的解釋力也愈大。
- 註十二：「Robust」的中譯，或可譯為「頑強性、韌性或穩定性」，但主要的意義在於指出把統計方法的一些基本假定放寬，甚至在違反的基本假定的情況下，統計檢定方法仍具有不偏與效率的性質，而可以被接受使用。
- 註十三：本文以Muthen and Muthen（2001）所發展的Mplus統計軟體，以及程式內設中的最大概似推估法，來進行因果模型中多元聯立方程式（simultaneous equations）的求解，並進行因果模型的簡化工作。順便一提的是，我們的分析旨在探討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僅以觀察變項作路徑分析的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並不在於作因果模型適合度檢定（model fitting）的結構方程式分析；所以，我們分析結果的報導與強調，在格式上或與一般模型檢定的分析呈現方式，略有風格上的不同。

參考書目

I. 中文部分：

吳乃德

- 1992 「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七十四期：33-60。

徐火炎

- 1996 「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爲：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間的實証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85-127。

- 1999 「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與選民的投票行爲」，*選舉研究*，五卷二期：35-71。

- 2001 「1998年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爲之分析：選民的黨派抉擇與分裂投票」，*東吳政治學報*，十三期：77-127。

- 2002 「台灣政黨版圖的重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比較」，*東吳政治學報*，十四期：83-134。

陳文俊

- 1995 「統獨議題與選民的投票行爲：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二卷二期：99-136。

盛杏媛

- 2001 「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爲」，*新政局的開端：2001年選舉研究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主辦，2001年11月17日。

II. 英文部分：

Berelson, Bernard R.

- 1952 "Democratic Theory and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6: 313-330.

Jung, Carl G.

- 1960 "A Review of the Complex Thoer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8. R. F. C. Edited and translated,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9 "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9, Part 1. R. F. C. Edited and translated,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1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Types." In *Psychological Types*. A revision by R. F. C. Hull of translation by H. G. Bay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ewiet, D. Roderick
- 1983 *Macro-economics & Micro-politics: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Issu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nder, Donald R., and D. Roderick Kiewiet
- 1979 "Economic Disconten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The Role of Personal Grievances and Collective Judgments in Congressional Vo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495-527.
- 1981 "Sociotrop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Ca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April): 129-141.
- Kuklinski, James H. (ed.)
- 2001 *Citize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wis-Beck, Michael S.
- 1990 *Economics &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ppmann, Walter
-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 Marcus, George E., W.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 2000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ler, Arthur H., and Wattenberg, Martin P.
- 1985 "Throwing the Rascals Out: Polic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1952-198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359-372.
- Muthen, Linda K., and Bengt O. Muthen
- 2001 *Mplus: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 User's Guide*. Los Angeles, CA: Muthen & Muthen.

Rokeach, Milton

1968 *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Rose, Richard, and Ian McAllister

1992 "Expressive and Instrumental Voting." In Dennis Kavanagh. (ed.). *Electoral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chwarz, Norbert, and Gerald L. Clore

1996 "Feelings and Phenomenal Experience." In E. Tory Higgins and Arie W. Kruglanski. (ed.).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New York: Guilford.

Sears, David O.

2001 "The Role of Affect in Symbolic Politics." In James H. Kuklinski. (ed.).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14-4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rs, David O. and Carolyn L. Funk

1991 "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4: 1-91.

Stimson, James A.

1991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Moods, Cycles, and Swing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Verba, Sidney

1965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iwan-China Complex and Taiwan-China Concern: Symbolic Politics in Taiwan's Elections

Huo-yan Shyu*

Abstract

"Taiwan vs. China" complex has been taken as the major factor that draws partisan line between parties along the "Taiwan-independence and China-unification" stance on the one hand and influences vote-choice among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on the other. Yet, this linkage has not been explored empirically as far. According to symbolic politics theory, Taiwanese vote-choices are influenced more by political affect than self-interes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ose political affect components, as shown either in determining individual's vote-choices or in party's strategy of electoral mobiliz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channeled down to this "Taiwan vs. China" complex. The paper recasts this culturally deep-seated concept by looking at its derivative psycho-political orientations, so-called "Taiwan vs. China" concern, which is measured by a cluster of affective-driven beliefs in Taiwan's supremacy and/or concerns for China.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ost-electoral survey data of the 1998 and 2001 legislative elections, two-factor structure is found in the "Taiwan vs. China" concerns, and this polarized affect orientation serves as a link to relat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o ethnic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party identification,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stance as well as to partisan vote-choice. Symbolic politics in Taiwan's election is thus confirmed by individual's affect-driven vote-choices. In sum, the paper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concludes that the empirical import of “Taiwan-China complex” concept can be identified as two groups of political affect components around “Taiwan vs. China” concerns in a two second-order factor analysis.

Key words: political mood, political emotion, political affect, symbolic politics, Taiwan-China concerns, Taiwan-China complex

